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增产效应与传导机制

——来自粮食生产任务发文机关差异的经验证据

李 宁[1]，钟 钰[2]

（1. 南京财经大学 粮食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2.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提出，将粮食安全责任约束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但强化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对地方政府行为与粮食增产的影响尚不明确。研究聚焦粮食生产任务“自上而下”层级分配的目标管理实践，构建“责任约束－任务设定－生产响应”理论框架，通过手工收集省市级粮食生产任务文本，利用发文机关的党政属性差异量化政治责任强度，考察地方政府应对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行为策略，并实证检验其对粮食增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地方政府以党委名义下发粮食生产任务，具有显著的粮食增产效应；其次，该效应主要通过作用地方政府的生产任务指标设定影响粮食增产，但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对粮食产量指标而非粮食面积指标的设定上，表现为地方政府在政治责任约束下，更倾向于增设产量指标、强化其硬约束属性，并通过任务加码传导单产提升压力；最后，这种压力传导并非依赖种植结构调整，而是体现为技术进步驱动的单产水平提升。研究为完善中国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治理体系提供了微观证据。

关键词： 粮食生产任务；党政发文机关；粮食安全；目标管理；政治责任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26)04－0025－15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粮食产需紧平衡与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我国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责任体系[1]，特别是 2020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将粮食安全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2]。此后，《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进一步为党政同责落地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两个核心问题：当粮食安全责任从行政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地方政府在履行粮食生产责任时会产生怎样的行为响应？这种政治责任又能否有效转化为粮食增产的实际效能？回答上述问题有助于揭示政治责任的传导路径，对构建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我国治理体系中，若将粮食安全责任仅限定于行政系统，既忽视了党委的关键责任主体地位，也易导致权责配置失衡与政治责任虚置[2]。因此，现有学者普遍认同将政治责任纳入粮食安

收稿日期： 2026－01－25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6.04.0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2273060）；南京财经大学科研创新课题（XKYC3202409）；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基础科学研究中心科学任务（CAAS-BRC-AERD-2025-01）

作者简介： 李 宁（1989—），男，安徽宣城人，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政策。E-mail：lnxueshu@sina.com

通讯作者： 钟 钰（1979—），男，辽宁锦县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粮食安全理论与政策。E-mail：zhongyu@caas.cn

全问责的必要性[3]，并就其实践价值[4]、落实情况[5]和机制构建[6]等方面展开探讨。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讨论空间：首先，多数文献以定性方法分析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缺乏对政治责任强度及其地区差异的量化测度，难以有效区分政治责任与行政责任对粮食生产的差异化影响，制约了对政策效应的精准评估。其次，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兼具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双重属性，其粮食生产责任履行本质上是融入地方意志的动态过程[7]。因此，评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效能的要义在于考察地方政府处理粮食生产责任的行为反应，但既有研究尚未构建解析其行为逻辑的系统框架，导致“政治压力→生产行动”的传导机制仍属黑箱，制约了对政治责任制度效能的深入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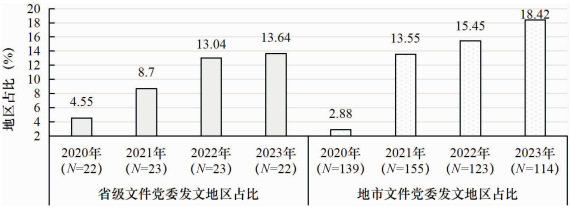
党政科层结构与目标管理责任制为政治责任的传导落实提供了组织基础与管理工具[8]。自2020年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纳入省级政府重点考核内容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省－市－县”多层级目标分解机制，标志着粮食生产正式进入指标化管理阶段[9]。2021年，“十四五”规划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列为约束性指标，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亦将其明确为年度目标，推动了粮食生产任务从弹性导向转向刚性约束。因而，通过观察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下地方政府在任务指标设定中的行为差异，既能揭示政治责任的约束效应，也有助于解析其影响粮食生产的作用路径。遗憾的是，尽管目标管理在经济增长[10]和官员晋升[11]等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但因粮食生产任务长期未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约束性目标且相关数据难以获取，该领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仍显不足。

为此，本文聚焦粮食生产责任“自上而下”的层级分配实践，从指标设定的微观视角切入，构建“责任约束－任务设定－生产响应”的分析框架，系统考察政治责任强化下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本文手工收集2020—2023年省、市两级粮食生产任务文本，依据发文机关党政属性差异量化政治责任强度，实证检验其对粮食增产的影响与机制，以期为优化考核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启示。

二、制度特征与理论分析

（一）粮食责任目标管理中的生产任务指标设定特征：文本分析

2020年起，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被纳入粮食安全年度考核重点，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层级化目标分解，建立起覆盖各级政府的粮食生产责任传导链。以此为核心的目标管理，构成了当前粮食安全责任配置与考核的重要制度基础。为系统揭示其运行特征，本研究通过检索政府网站、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与实地调研，收集了2020—2023年省级（90份）和地市级（531份）粮食生产任务分配文本，并进行结构化信息提取。依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政策文本主要包含标题（发文机关、事项、文种）、正文与附件三部分。本文重点从发文机关的党政属性及附件中的生产任务指标两个维度，梳理粮食责任目标管理中指标设定的实际运行特征：第一，粮食生产任务发文机关呈现显著的党政二元特征，且自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后党委系统参与度显著提升（见图1）。2021年省级党委发文主体占比提升91.2%，地市级层面增幅达370.5%。第二，在生产任务指标设定上，粮食面积指标在省、市两级任务设定中均实现全覆盖并被界定为硬约束（“约束性指标”“底线指标”或“考核底线”），而粮食产量指标的采用率和约束强度相对较低（“参考性”“指导性”等弱约束指



注：N为对应年份明确知道发文机关的文本数。

图1 粮食生产任务党委发文情况

标),且地市层面产量指标加码程度显著高于面积指标(见表 1)。这种“面积刚性管控、产量弹性引导”的指标组合设计,为识别政治责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规制效应提供了独特视角。

表 1　粮食生产任务文本中的指标设定　　**单位:%**

文本地区	核心指标	指标采用率	指标约束强度	指标加码	
				加码地区占比	数值加码均值
省级文件(N=43)	粮食面积	100	硬约束:100		
	粮食产量	83.72(N=36)	软约束:44.4(N=16)		
地市文件(N=449)	粮食面积	100	硬约束:100	29.67	0.33
	粮食产量	89.09(N=400)	软约束:23.54(N=106)	38.61	1.07

注:N 为文本中获得分解表附件的数量。

(二)理论分析: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生产任务指标设定与粮食增产

粮食增产始终是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其中,年度粮食生产任务既是地方政府施政意图的集中反映,也是构建责任传导的制度抓手。由于粮食产量变化直接受播种面积和单产水平影响,而这两类指标与各级政府责任目标紧密关联,因此,探究地方政府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如何设定和调整这些任务指标至关重要。本部分旨在构建“责任约束 - 任务设定 - 生产响应”的分析框架(如图 2 所示),系统阐释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如何重塑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影响其在粮食播种面积与产量两类指标上的差异化设定策略,并最终传导至生产端驱动粮食增产。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要求地方政府从政治高度审视粮食安全,其核心制度创新在于将责任主体从行政系统扩展至党政双重主体,打破传统上“政府负责执行、党委侧重决策”的分工界限,进而强化责任约束:其一,形成了“双重压力网络”。传统上粮食安全主要由地方政府(尤其是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地方党委被正式纳入责任主体,使得粮食安全从一项主要的政府行政工作,升级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构建了决策与执行一体化的责任共同体,有效压缩了政策推诿与执行打折的空间。其二,构建了“刚性问责链路”。依托“党管干部”原则,粮食安全履职情况被深度嵌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通过“关键少数”机制,与干部的晋升、奖惩直接挂钩,使粮食安全责任从柔性行政责任制转化为具有政治纪律色彩的硬约束,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与响应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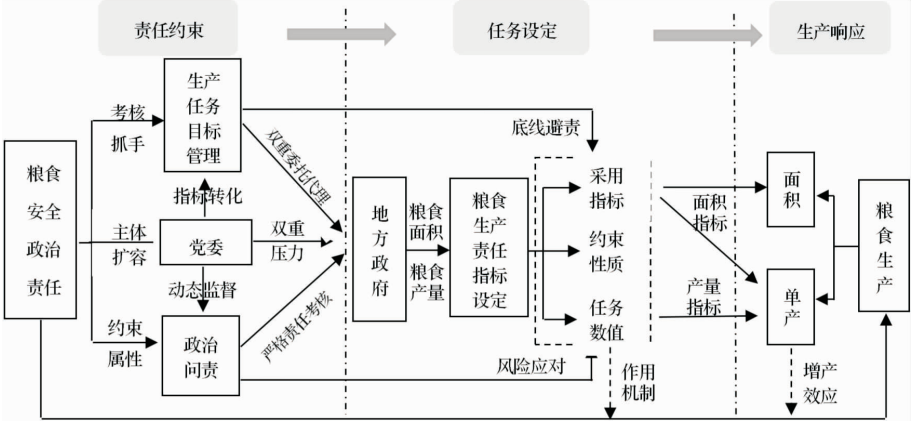


图 2　“责任约束 - 任务设定 - 生产响应”理论框架

在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下，地方政府在粮食生产领域扮演着“对上承接任务、对下分解指标”的双重角色，这赋予了其在任务指标再设定过程中的“策略性空间”。然而，地方政府的履责意愿受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情境的深刻影响。一个关键的制度背景是，粮食生产任务与地方主导的经济增长任务存在典型的“激励结构差异”：粮食生产考核通常是以保障产能底线为目标的“负向激励”（防止减产，惩罚下滑），而经济增长则是追求增量的“正向激励”（鼓励超额，奖励增长）。这种差异导致地方政府普遍对粮食生产采取“底线避责”策略，即以确保完成最低任务要求、规避问责风险为核心目标，而非追求产量最大化。因此，政治责任约束的引入与强化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提升考核的政治权重和问责刚性，加强了制度约束力；另一方面，责任约束可能进一步固化了地方政府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底线避责”倾向。这种张力必然反映在粮食生产任务指标的设定环节。

责任指标的选择深刻反映了各行为主体的理性计算与风险偏好。在粮食生产领域，播种面积与粮食产量是两项核心指标，但地方政府对其设定的逻辑存在差异。对于粮食播种面积指标，因其具有可观测、可验证（如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受自然因素干扰小的特点，已成为上级考核下级最可靠、争议最小的硬抓手。它本质上是控制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的“底线型”指标。对于理性的地方政府而言，在扩种粮食经济激励不足的背景下，即便面临政治责任压力，也缺乏动力去主动提高面积任务的承诺值（加码）。相反，为了绝对确保完成、避免政治风险，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在向下分解时，严格对标甚至略微保守地设定面积指标，仅要求下级完成上级下达的底线任务，最大限度规避考核风险。而对于粮食产量指标，情况则更为复杂。产量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风险影响大，考核不确定性高，地方政府存在天然的避责动机。但另一方面，粮食产量直接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物供给，是上级关注的终极核心，且与“产粮大县”奖励等经济绩效关联。因此，在政治责任约束下，地方政府对产量指标的态度呈现出“风险与绩效平衡”的特征。一个可行的策略是：在确保面积底线无虞的基础上，通过强化产量指标考核传导压力，如增设产量指标、提高目标值或明确为硬约束。其意图并非直接控制自然产出，而是以产量目标倒逼下级政府采取可行措施提高单产水平。

进一步而言，相较于粮食面积受到耕地面积和优势经济作物竞争的限制，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具有更大的政策空间，较易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如扩种高产作物）和技术进步（如改善生产基础条件、引进新技术装备）等手段加以干预。然而，在“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框架下，通过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调整提升单产的空间已显著收窄：一方面，近年来我国粮食增产已部分得益于玉米对大豆、薯类的替代，结构调整的边际收益递减；另一方面，国家为降低大豆进口依赖持续强化大豆扩种，而大豆单产显著低于谷物，这进一步压缩了结构调整空间。换言之，依靠粮食内部结构调整实现粮食增产的空间有限[12]。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在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下，地方政府更可能倾向于通过技术路径提升单产，以此实现增产目标。反映在指标设定上，地方政府在确保播种面积底线任务完成的基础上，更倾向于通过强化产量指标设定（如增加指标数量、加码数值、强化硬约束属性）向下级政府传导单产提升压力。这种策略的内在逻辑在于：第一，更具确定性。相较于种植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如农田建设、农机装备升级等）能够有效规避结构调整的自然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生产波动。第二，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不仅能提高粮食单产，还能降低生产成本，增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第三，契合中央政策导向。通过加大对农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地方政府不仅能更好地完成粮食安全考核任务，还能提升在上级政府中的政治声誉，为未来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分配创造有利条件。近年来各级政府将高标准农田建设、种业振兴等置于优先位置，正是这一逻辑的现实体现。

基于上述“责任约束 - 任务设定(指标选择) - 生产响应(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化具有显著的粮食增产效应;

假说 2:政治责任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生产任务指标设定作用于粮食增产,但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对粮食产量指标而非粮食面积指标的设定上。表现为地方政府在政治责任约束下,更倾向于增设产量指标、强化其硬约束属性,并通过加码数值向下传导单产提升压力。

假说 3:在政治责任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产量指标设定传导的增产压力,并非依赖种植结构调整,而是主要体现为技术进步驱动的单产水平提升。

三、研究设计

(一)文本收集与处理

作为粮食生产责任目标管理的起点,粮食生产任务文本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数据来源。鉴于此类文本的非公开性,本研究结合政府网站检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与部门实地调研,系统收集了 2020—2023 年省级和地市级政府每年年初制定的粮食生产任务文本。其中,省级文件任务向地级行政区分解,地市级文件则体现对省级任务的二次调整与县域再分配。依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2012 年实施),本研究聚焦公文中的两类关键信息:发文机关标识(反映党政约束差异信息)与附件任务分配表(载明指标设定详情)。经清洗并剔除信息缺失或错误样本后,最终构建了覆盖 25 个省份 175 个地市的 2020—2023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明确发文机关的文本含省级 90 份、地市级 531 份;具备完整指标设定信息的文本含省级 43 份、地市级 449 份。

(二)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强度识别:发文机关的党政属性差异

为量化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度的区域差异与动态变化,本文以年度文本发文机关中是否含有市(州)党委(办公室)或市(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为依据,判断该地市在该年度是否受到较强的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含有党委系统则赋值为 1,反之为 0。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二元划分并非判定责任有无,而是反映政治责任强度的相对差异。识别逻辑如下(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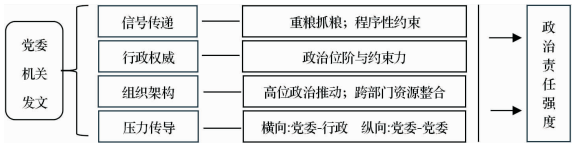


图 3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度的识别逻辑

首先,信号传递层面,政策性文件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征,当党委系统作为发文机关参与或主导文件的制发时,作为一种强烈的重粮抓粮和直接参与责任管理的信号,一方面向行政体系内外传递出党委对粮食生产责任的关注与重视,另一方面通过形成程序性约束机制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即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就年度粮食生产目标完成情况向发文党委机关进行专项报告,这使得政治约束直接嵌入政策执行过程。

其次,行政权威层面,党委发文具有更高的政治位阶与约束力。以市级党委名义发布的粮食生产任务文件,通常由市委书记或分管农业的副书记主责推进,其行政级别对应正厅或副厅层级,显著高于正处级的农业农村局局长行政位阶。当采用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名义行文时,组长职务配置同样体现权威层级特征——多数地区由市委常委担任,部分重要地区甚至由市委书记直接兼任。这种“领导挂帅”的层级配置实质上构建了差异化的任务约束效力:领导职务层级越高,政策执行的强制性和问责压力越显著。

再次,组织架构层面,中国国家治理遵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分级管理、部门协同”的基本原则。这种制度安排强化了纵向权力的主导地位,客观上形成了横向协作的结构性制约。粮食生产作为涉及农业、财政等多部门的系统工程,其绩效提升亟须突破部门壁垒实现协同治理。为此,党委牵头设立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将粮食生产提至政治议程核心,发挥了统筹协调优势:一方面,通过高位推动将部门间的横向协商转化为纵向的“目标-责任”传导体系,以政治势能打破科层制固有的职能分割与权责模糊;另一方面,借助党的组织网络整合“条块”资源,使粮食安全约束突破农业部门的边界,形成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治理格局。这种党政体制对科层局限的补位机制,已被学界视为中国治理效能的重要制度优势。

最后,压力传导层面,粮食生产任务通知作为下行公文的核心要件,其法定效力首先通过明确主送机关的行政隶属关系得以确立。当这类文件由党委系统制发时,发文对象既包括行政职能部门,也涵盖下级党组织体系。本文采集的65个地市级党委发文样本显示,78.46%的文本将区县党委系统与政府(或行政职能部门)并列为联合主送机关,这种制度设计突破了传统行政条线管理的路径依赖。下级党委系统在接受文件后,需根据上级党委的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工作要求,继而以本级党委为发文机关,将粮食生产任务以通知的形式继续向下级单位尤其是党委施加约束。这种由政策执行者向政策制定者的身份转换,实质上构建了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双向传导路径,既通过“党委-党委”垂直传导机制强化政治势能,又借助“党委-政府”横向传导路径压实行政责任。

(三)基准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1. 模型设定

本文聚焦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增产的影响,据此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Y_{ct} = \alpha_1 + \beta_1 Party_{ct} + \lambda_1 z_c \times f(t) + \upsilon_t + \mu_c + \varepsilon_{ct} \quad (1)$$

(1)式中,因变量 Y_{ct} 表示地市 c 在第 t 年的粮食生产情况。$Party_{ct}$ 为地市 c 在第 t 年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情况。z_c 为系列控制变量,为避免产生“坏控制变量”问题,控制政策实施前(2019年)的地市经济社会特征,同时考虑到这些变量不随时变,引入这些特征变量与时间函数的交互项 $z_c \times f(t)$,具体形式包括与时间趋势项及年份虚拟变量的两类交互,以捕捉其随时间变化的潜在影响。μ_c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用于捕捉不随时变的个体异质性因素,如文化传统、地理条件等。υ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用以控制随时变但不随个体变化的宏观因素,如经济周期等。ε_{ct} 为随机误差项,a_1 为常数项,β_1 为本文关注的核心参数。此外,在回归中采用聚类到省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粮食增产率。鉴于各地市粮食生产规模差异较大,因此参考已有文献[13],以粮食增产率衡量粮食生产绩效。数据来自各地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核心解释变量: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粮食生产任务发文机关的党政属性差异量化政治责任强度。若发文机关含市(州)党委(办公室)或市(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认定该地市该年度受到更强的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约束,$Party_{ct}$ 变量赋值为1,反之 $Party_{ct}$ 赋值为0。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选取遵循外生性与前定性原则,主要包括两类:(1)气候条件,选取年均气温和年降雨量作为当期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2)经济社会特征,选取2019年的产业结构、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化率、人均粮食产量和财政压力等指标作为政策实施前的前定变量。为控制这些不随时变但效应可能随时间演变的因素,本文将其与时间函数(时间趋势项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纳入模型。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市统计年鉴。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与赋值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粮食增产率	(当期粮食产量 - 上期粮食产量)/上期粮食产量 × 100%	531	1.01	3.84
核心解释变量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粮食生产任务发文单位含党委机关时,赋值为 1,否则为 0	531	0.12	0.33
控制变量				
年均气温	单位:摄氏度	531	15.19	4.69
年降雨量	单位:毫米	531	1109.28	435.96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增加值/GDP × 100%	531	11.27	6.51
人均生产总值	GDP/常住人口数(万元/人)	531	6.40	3.48
城镇化率	城镇常住人口数/常住人口总数 × 100%	531	59.52	12.78
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地区常住人口数(公斤/人)	531	472.77	390.53
财政压力	(一般预算财政支出 - 一般预算财政收入)/一般预算财政收入	531	2.65	2.98

四、模型估计结果

(一)基准估计: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增产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列(1)至列(3)依次纳入双向固定效应及经济社会前定变量与时间趋势、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在各设定下均至少在 5% 水平下正向显著且数值稳定,表明模型设定较为稳健,且遗漏变量问题威胁并不严重。以控制最严的列(3)为准,相较于非党委发文地市,党委发文地市的粮食增产率平均高出约 2.127 个百分点。结合变量标准差(0.328),该效应相当于 0.7 个百分点的标准化差异(2.127 × 0.328),约占样本粮食增产率标准差的 18.2%,表明在统计和经济学意义上均具有显著影响。这初步支持了假说 1,即强化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能有效促进粮食增产。

表 3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变量	粮食增产率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 设置)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2 设置)		
				离散变量形式		连续变量形式
				0 值为基准组	1 值为基准组	
	(1)	(2)	(3)	(4)	(5)	(6)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 设置)	1.895**(0.899)	1.968**(0.801)	2.127***(0.753)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2 设置)						1.144**(0.420)
无党委发文(0)					-2.521*(1.235)	
市(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文(1)				2.521*(1.235)		
市(州)党委发文(2)				1.787*(0.908)	-0.734(1.526)	
天气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市特征 × 时间趋势项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变量	粮食增产率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 设置)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0/1/2 设置)		
				离散变量形式		连续变量形式
				0 值为基准组	1 值为基准组	
	(1)	(2)	(3)	(4)	(5)	(6)
地市特征×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036	0.059	0.157	0.156	0.156	0.153
样本量	531	531	531	531	531	53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聚类到省级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为进一步检验核心变量构造的合理性,本文在列(4)至列(6)中对党委发文类型进行了细分,将"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变量设为三分类变量:无党委发文=0、市(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文=1、市(州)党委(办公室)发文=2。结果显示,以"无党委发文"为基准组时,两类党委发文均对粮食生产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但以"市(州)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文"为基准组时,两类党委发文的影响差异并不显著。换言之,党委细分并未获经验支持,其中的原因至少可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组织同源性,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党委议事协调机构,组长多由市委常委或市委书记兼任,其发文实质是党委意志的制度化表达;二是传导路径趋同,无论以何种党委名义发文,均构建"党委-党委"纵向与"党委-政府"横向双重压力网络,传导路径相似使两类发文在实践中难以产生差异化增产效应。此外,列(6)将三分类变量以连续变量形式纳入模型,结果仍显著,但估计系数相较列(3)有明显下降,这与测度误差导致"衰减偏误"的理论预期相符。为此,综合表3列(4)至列(6)的估计结果,本文将"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处理为二分变量是合理且稳健的。

(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工具变量法,并基于地市党委发文的影响因素,选取如下变量构造工具变量:(1)省级粮食生产任务文本发文机关是否包含党委系统。中国"权责同构"体制下,省、市两级政策文本的发文主体具有高度同构性,这确保了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同时,地市级文件发布时间晚于省级文件,难以逆向影响上级决策,因而满足外生性条件。(2)地市与其所属省份省会的质心距离。地理距离作为外生变量满足排他性约束,且已有研究表明空间距离显著影响政府间的信息传递与监管效力[14]。在粮食安全责任考核中,地理邻近性通过影响省级监管强度与效率进而作用于地市党委的介入决策,这构成了相关性基础。鉴于地理距离不随时间变化,直接引入将被固定效应吸收,故参照 Nunn 和 Qian[15] 的做法,构造上述两个变量的交互项,既保留了地市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又借助省级政策差异增加了工具变量的变异。

表4列(1)至列(2)报告了 IV-2SLS 估计结果。第一阶段回归显示,工具变量在1%水平下显著影响"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变量,且第一阶段 F 统计量高达 97.29,远超经验阈值 10 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在10%水平下的临界值(16.38),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在采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增产率仍保

持正向显著性。关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的检验,由于工具变量个数与内生变量个数相同,无法采用传统的过度识别检验方法。为此,本文通过构建简约式模型进行间接验证:列(3)至列(4)显示,工具变量在未控制内生变量时对粮食增产率影响显著,而控制内生变量后其直接效应不再显著,这种估计系数的系统性变化支持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表明工具变量主要经由内生变量影响结果,而非直接作用于被解释变量。综上,工具变量在相关性与排他性两方面均通过检验,IV 估计进一步强化了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增产效应因果推断结论的可靠性。

表 4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IV-2SLS		外生性检验	
	第一阶段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第二阶段 粮食产量增长率	粮食增产率	
	(1)	(2)	(3)	(4)
工具变量(省级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地市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	0.115***(0.030)		0.495***(0.160)	0.306(0.193)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4.308***(1.659)		1.641*(0.816)
Stock-Yogo 临界值(10%)	16.38			
一阶段 F 值	97.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486	0.040	0.157	0.164
样本量	515	515	515	515

2. 稳健性检验

(1)遗漏变量偏误检验

由于本文核心自变量在“地市 - 年份”维度变动,模型无法直接控制二者的交互固定效应,因此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对此,本文采用 Oster[16] 提出的方法通过可观测变量评估不可观测变量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影响:方法一,给定遗漏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和可观测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之间的比值 δ(通常设定为 1)以及包含了遗漏变量模型的最大拟合优度 R_{max}(根据 Oster 的建议,设定为 1.3 倍基准拟合优度),模拟核心自变量的系数估计值 β。若 β 位于基准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内,则表明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方法二,在 R_{max} 同上(同样为 1.3 倍基准拟合优度)且假定真实效应 $\beta=0$ 时,计算临界比值 δ。若 $\delta>1$,则表明遗漏变量具备超过可观测变量 1 倍的解释力才能推翻基准结论。按此思路,方法一模拟的 β 值为 2.115,完整落入基准估计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0.565,3.690],且与基准回归估计值 2.127 相差不大,表明遗漏变量对结果的影响有限。方法二计算得到 δ 为 23.18,显著高于判断阈值 1,说明遗漏变量需要具备极强的解释力才能对基准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两项检验一致表明,遗漏变量导致实质性偏误的门槛较高,基准结论稳健。

(2)排除竞争性假设

本文可能面临一项竞争性假设:若党委发文时行政约束同步强化,则观测到的增产效应或仅源于行政约束加强而非政治责任。本部分采用以下两种策略排除这一干扰。

第一,控制行政约束差异。理论上,行政约束力度可能受政区类型、行政级别和发文行政机关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依次筛选样本以排除此类干扰:表 5 列(1)聚焦地级市样本,排除自治州等政区类型的结构性差异;列(2)至列(3)剔除副省级城市及非地级市政区,消除行政层级

干扰;列(4)删除市级人民政府发文样本,避免发文机关层级提升(如从农业农村局上升至市人民政府)所致的约束力度变化。第二,提供行政约束强化难以完全解释政治责任影响的证据。行政约束通常通过政府行政系统传导,而在行政机关约束力上,人民政府要高于行政职能部门。因此,若政治责任独立于行政约束,那么在文件制发中应观察到党委发文更多指向下属区县党委(而非人民政府)。表5列(5)至列(8)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推断: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显著提升了下属区县党委成为主送机关的概率,但对区县人民政府是否作为主送机关并无显著影响。这表明政治责任通过党委系统传导,即使存在行政约束的共时性强化,亦难以完全掩盖政治责任对粮食增产的独立贡献。综上,排除行政约束变化的竞争性干扰后,基准结论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5 排除竞争性假设:行政约束强化

变量	粮食增产率				主送机关是否有区县党委	主送机关是否有区县人民政府		
	地级市政区样本	不含副省级城市		不含市政府发文				
		全政区类型样本	地级市样本					
	(1)	(2)	(3)	(4)	(5)	(6)	(7)	(8)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2.469***	1.912**	2.253***	3.664*	0.692***	-0.059		
	(0.746)	(0.755)	(0.757)	(1.854)	(0.134)	(0.060)		
市党委发文							0.027	
							(0.075)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文								-0.137
								(0.1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183	0.165	0.194	0.101	0.595	0.078	0.075	0.081
样本量	489	515	473	242	438	438	440	440

五、机制分析

(一)粮食面积指标设定机制的排除性讨论

理论上,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扩大种植面积主要通过3种途径实现:一是调整农作物内部结构,将经济作物改种为粮食作物;二是减少耕地占用规模;三是通过土地复垦等方式重新利用未使用的耕地或者改造土地利用方式。但需要注意的是,粮食面积指标作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底线目标,已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下对地方政府形成防范农地"非粮化""非农化"的刚性约束。因此,当粮食面积指标仅需完成底线目标即可考核达标时,额外施加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既不会增强地方政府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性,也难以提供增量的政策空间。基于此,本文认为粮食面积的指标设定及实际变化并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产生增产效应的内在机制。

表6实证结果印证了上述推断: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增长率[列(1)~(2)]及粮食面积绝对数值增长率[列(3)~(4)]的影响来看,各模型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政治责任并未引致粮食面积的额外扩张。指标设定层面,列(5)~(6)显示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粮食面积指标设定无显著影响。进一步以地市向下分解面积任务总量相对于省级任务的增加比衡量加码程度[列(7)~(8)],结果同样不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一致,在政治责任强问责压力下,地方政府对已具硬约束的面积指标趋于"底线执行",甚至可能压低主动加码幅度(估计系数为负),

以规避未达自报目标的考核风险。综上,粮食面积的实际变化及其指标设定并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发挥增产效应的作用渠道。

表 6　排除粮食面积指标设定的作用机制

变量	粮食面积占比增长率		粮食面积增长率		粮食面积任务指标数值		粮食面积任务加码程度	
	OLS	IV	OLS	IV	OLS	IV	OLS	IV
	(1)	(2)	(3)	(4)	(5)	(6)	(7)	(8)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0.138	0.438	-0.101	-0.428	-0.091	0.258	-0.126	-1.555
	(0.416)	(1.065)	(0.392)	(0.396)	(1.647)	(2.974)	(0.477)	(1.187)
一阶段 F 值		68.35		98.32		80.49		34.99
Stock-Yogo 临界值(10%)		16.38		16.38		16.38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084	0.192	0.049	0.066	0.024	1.000	0.081	0.108
样本量	406	394	531	519	443	429	285	280

(二)粮食产量指标设定机制的直接证据

由于农业生产天然面临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粮食产量不达标的责任难以明确界定。相较之下,粮食播种面积指标依托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可精准追踪,责任边界清晰、考核成本低,呈现“刚性化”的底线特征,而粮食产量指标则保留了弹性设定空间。这一制度性差异,为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影响粮食生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当扩大粮食面积难以成为增产的有效手段时,调整粮食产量指标设定、向下传导单产提升压力,便成为地方政府应对政治责任的理性策略。该行为不仅反映出地方政府履行粮食安全党委责任的意愿强度,也揭示了其在政治责任约束下的增产导向。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粮食面积指标只能从数值设定和加码角度进行机制讨论(因为粮食面积指标采用和硬约束设定地区占比均为 100%),粮食产量指标具有更多的讨论空间:其一,在指标采用层面存在地区差异,并非所有地方政府均设定该指标;其二,在约束性质上存在软约束与硬约束之分;其三,在数值设定上具有弹性空间,可根据实际进行加码调整。这种制度弹性为观察政治责任的作用机制提供了重要窗口。

表 7 的结果验证了上述推断。第一,在指标采用上,构建“地市级文件是否增设省级未要求的产量指标”变量[列(1)],结果显示,在控制省级文本是否包含产量指标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显著提升了地市政府采用产量指标的概率。第二,在约束性质上,本文将文本中标注为“参考性”“预期性”的指标界定为软约束,将“底线指标”“考核底线”类表述界定为硬约束。在控制省级粮食产量指标约束性质(是否为硬约束)后,列(2)回归结果显示,政治责任显著提升了地市政府将产量指标设定为硬约束的倾向。第三,在数值设定上,参照粮食面积加码程度的测算方法,列(3)估计结果显示,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显著提升了产量任务的加码幅度。综合上述 3 方面的指标设定分析可知,地方政府在应对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时,通过强化产量指标设定传导单产提升压力,构成了政治责任的作用路径。为直接验证单产驱动效应,本文进一步构建“粮食单产任务加码率”(衡量省市两级粮食单产任务值差异)和“粮食单产实际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列(4)至列(5)]。回归结果显示,政治责任不仅促使地方政府在指标设定中隐含单产提升要求,更实质性地推动了单产实际增长。这一发现有力佐证了假说 2,同时为假说 3 提供了直接证据——在政治责任约束下,地方政府通过强化产量指标设定传导增产压力,并最终体现为粮食单产水平的显著提升。

表7 粮食产量指标设定机制讨论

变量	指标采用	指标约束性质	指标数值		粮食单产实际增长率
	地市是否增设省级未要求的产量指标	地市粮食产量指标是否是硬约束	粮食产量任务数值加码率	粮食单产任务加码率	
	(1)	(2)	(3)	(4)	(5)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0.118**(0.053)	0.344***(0.094)	3.694***(1.260)	5.644***(1.239)	0.041***(0.012)
一阶段 F 值	61.67	74.12	29.19	30.38	97.29
Stock-Yogo 临界值(10%)	16.38	16.38	16.38	16.38	16.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省级有无粮食产量指标	是				
省级粮食产量指标约束性质		是			
调整 R^2	0.355	0.431	0.266	0.210	0.056
样本量	297	241	241	233	515

(三)粮食单产水平提升的来源:种植结构调整还是技术水平提升

1. 种植结构调整的机制排除检验

在实际生产维度,若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并未显著影响高产粮食作物的面积扩张,则可进一步支持种植结构调整不成立的推断。表8列(1)~(6)的大类品种分析结果显示,谷物类作物作为粮食安全的核心,其面积占比增长率并未受到政治责任的显著影响。与此同时,薯类作物面积占比的下降与豆类作物面积占比的上升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大豆为代表的豆类扩种主要来源于薯类面积的替代性调整。此外,谷物和大豆单产增长率的显著提升,进一步验证了地方政府通过单产水平提升实现增产目标的策略选择。进一步细分作物结构,列(7)~(14)表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显著促进了稻谷、玉米和大豆的单产水平提升。尽管小麦单产增速有所放缓,可能源于其机械化水平已较高,技术改进的边际收益递减,以及地方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对其他作物技术投入的倾斜。更为关键的是,高产作物(稻谷、玉米、小麦)的播种面积占比变动也均未受到政治责任的显著影响[列(7)、(9)、(11)],反而大豆面积占比增速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排除了种植结构调整作为单产提升主要路径的可能性,强化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机制的解释力。

2. 技术水平进步驱动路径检验

为验证粮食单产提升的技术进步机制,本文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亩均农业机械动力和劳均粮食播种面积(按乡村从业人数计算)作为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对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进行回归分析。表9列(1)至列(3)显示,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对各项技术指标增长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

表8 粮食种植结构的实际变动

变量	三大类粮食作物之间种植结构					
	谷物类粮食		薯类粮食		豆类粮食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1)	(2)	(3)	(4)	(5)	(6)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0.822(0.549)	7.073***(2.279)	-28.056**(11.821)	6.682(9.219)	16.320**(7.427)	15.260**(7.129)
一阶段 F 值	39.314	38.2	15.944	14.670	63.386	55.14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110	0.294	0.294	0.204	0.062	0.130
样本量	271	268	332	305	312	281

续表

变量	三大类粮食作物内部种植结构							
	谷物内部结构						豆类内部结构	
	稻谷		玉米		小麦		大豆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面积占比变动率	单产变动率
	(7)	(8)	(9)	(10)	(11)	(12)	(13)	(14)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2.255 (4.769)	7.430** (2.960)	-2.831* (1.586)	6.021* (3.272)	2.660 (3.505)	-8.071** (4.010)	17.878** (7.492)	9.657*** (3.298)
一阶段 F 值	115.227	113.559	78.339	77.847	47.688	47.688	69.556	67.16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210	0.205	0.196	0.240	0.149	0.019	0.003	0.300
样本量	354	348	381	378	339	334	323	318

响,与理论预期一致。进一步地,考虑到农业技术采纳与应用受自然地理条件制约,本文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对限制开垦坡度的规定,将地市样本划分为平缓地区(平均坡度 <25 度)和陡峭地区(平均坡度≥25 度)进行分组回归[列(4)~(5)]。结果显示,政治责任在两类地区均具有显著增产效应,但地势平缓地区增产效应更高且组间差异显著,表明在地理条件更适宜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地区,政治责任能更高效地促进粮食增产。

此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旨在提升产能,也致力于通过技术手段增强系统抗风险韧性,弱化自然灾害对粮食安全的负面影响。若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实能够推动农业技术进步,那么可以合理推断,这种约束效应能够通过技术手段缓解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冲击。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引入省级层面的农作物受灾率(农业受灾面积与农作物总面积的比值)作为地市的外生风险变量,构建其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交互项进行实证检验。列(6)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治责任有效缓解了农业自然灾害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综上,实证证据表明: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显著推动了粮食增产,且这一效应在自然条件适宜技术干预的地区表现更为突出。

表 9　粮食生产技术进步驱动机制检验

变量	有效灌溉增长率	亩均农机动力增长率	劳均粮食播种面积增长率	粮食增产率		粮食增产率
				坡度大于 25 度地市	坡度小于 25 度地市	
	(1)	(2)	(3)	(4)	(5)	(6)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4.947***(1.279)	1.042**(0.526)	6.461***(1.153)	4.004**(2.015)	10.213***(1.600)	8.453***(2.651)
农作物受灾率						-0.624***(0.184)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农作物受灾率						-0.161***(0.062)
一阶段 F 值	48.302	43.712	59.017	61.387	25.709	246.936
Stock-Yogo 临界值(10%)	16.38	16.38	16.38	16.38	16.38	7.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组间差异检验				-6.209***		
调整 R^2	0.041	0.379	0.094	0.099	0.379	0.095
样本量	291	362	221	431	84	512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对政治责任的强化,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制度内涵,更为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促进粮食稳产增产提供了新的政策抓手。本文聚焦粮食生产任务"自上而下"层级分配的目标管理实践,从生产任务指标设定的微观视角切入,构建"责任约束-任务设定-生产响应"理论框架,考察地方政府应对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行为策略,并基于手工收集的"省-市"两级政府发布的粮食生产任务文本,利用文本发文机关的党政属性差异量化政治责任强度,实证检验其对粮食增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党委发文显著促进了粮食增产,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在政治责任约束下强化粮食产量指标的设定(增设指标、硬化约束、加码数值),进而通过技术进步驱动单产提升实现增产,而非依赖粮食面积扩张或种植结构调整。

上述发现与既有理论形成了有益的对话:首先,在目标管理责任制的研究传统中,已有文献多关注经济增长领域的"层层加码"现象,而本文揭示了粮食安全领域的一种差异化加码逻辑:地方政府对已具硬约束的"底线型"指标(粮食面积)倾向于保守执行,对保留弹性空间的"绩效型"指标(粮食产量)则主动加码。这补充了关于不同任务属性下地方政府行为策略的理论认识。其次,与"晋升锦标赛"理论强调的经济增长正向激励不同,粮食安全考核具有"负向激励"特征。本文发现,政治责任强化并未完全改变地方政府的"底线避责"倾向,而是使其在底线之上寻求技术驱动的增量产出。这丰富了多任务委托-代理情境下政治激励异质性效应的理论解释。最后,本文从指标设定这一微观视角打开了政治责任传导的"黑箱",区别于既有研究将"党政同责"视为整体制度的宏观分析,揭示了党委介入如何通过任务指标的硬约束与主动加码,将政治责任转化为生产效能的具体路径,这为理解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治理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微观证据。

基于上述结论的政策启示如下:首先,强化政治问责,发挥治理优势。建议进一步推动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实施,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粮食安全的治理优势。其次,优化指标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建议将粮食单产增长率、技术进步贡献率等更能体现地方政府努力程度的核心绩效指标,纳入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并显著提升其考核权重,从而将政治责任压力转化为干部追求粮食增产的内生激励。

参考文献:

[1]Zhang Y, Lu S. Food politics in China: how strengthened accountability enhances food security[J]. Food Policy, 2024,128:102692.

[2]邓大才.政治催生大户:粮食安全责任与地方、农民的行动策略[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6):14-26.

[3]常璇.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J].经济学家,2024(3):5-14.

[4]孙佑海,孔垂鹏.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的现实价值和立法表达[J].中国土地科学,2023(9):1-9.

[5]刘慧,赵一夫.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情况、制度完善与分区域保供路径[J].中州学刊,2023(1):52-60.

[6]刘明月,普蕖喆,钟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党政同责机制构建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29-37.

[7]李宁,周琦宇.嵌入的机制探究:撤县设区中的粮食安全主体责任转变[J].农业经济问题,2023(3):72-87.

[8]曹新富,周建国.河长制何以形成:功能、深层结构与机制条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11):179-184.

[9]李宁,李婧慧.粮食产能安全责任的制定与层级政府分配[J].农村经济,2024(5):66-76.

[10]余泳泽,潘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J].经济研究,2019(3):150-165.

[11]Li X, Liu C, Weng X, et al. Target setting in tourna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Economic Journal, 2019(623):2888-2915.

[12]毛学峰,刘靖,朱信凯. 中国粮食结构与粮食安全:基于粮食流通贸易的视角[J]. 管理世界,2015(3):76 - 85.
[13]罗斯炫,张俊飚. 丰收的嘉奖:财政激励与粮食增产[J]. 中国农村经济,2024(8):27 - 46.
[14]Huang Z,Li L,Ma G,et al. Hayek, local information, and commanding heights: decentraliz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8):2455 - 2478.
[15]Nunn N,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6):1630 - 1666.
[16]Oster E. Unobservable selection and coefficient stability: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2019(2):187 - 204.

The Yield-Increasing Effect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Joint Party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Food Secu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Differences in Issuing Authorities of Grain Production Task Documents

LI Ning[1], ZHONG Yu[2]

(1. *Research Center for Food Security and Strate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joint Party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has elevated food security accountability to an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level. However, how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for food security affects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and grain output growth remains uncle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arget management practice of top-down hierarchical alloc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tasks and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ccountability constraint → task setting → production response" to analyze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al strategies under food security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ased on manually collected provincial and municipal grain production task documents, this study quantifies the intensity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y exploiting differences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attributes of issuing authoriti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its yield-increasing effect and underly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local governments that issue grain production tasks in the nam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generate a significant grain yield-increasing effect. Second, this effect mainly functions by shaping local governments' grain production task indicator setting, which concentrates on grain yield indicators rather than grain sown area indicators. Constrained by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add yield indicators, strengthen their mandatory binding force, and pass on pressure to raise per-unit yield by raising task targets. Finally, such pressure transmission does not depend on planting structure adjustment, but instead reflects higher grain yields driven by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results provide micro-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China's joint Party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system for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grain production task indicators; joint Party and government issuing documents; food security; target management;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责任编辑:毛殷】